

第一章 丘峦崩摧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

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

……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危在旦夕

公元 189 年可以视为东汉已经灭亡的实际时间。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那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一个傀儡般的皇帝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挣脱历史的选择。

可是，东汉的覆亡足够让很多“葛优瘫”着的人从沙发上跳起来。这是一个让历代史学大家都有应激性反应的大悬案。原因很简单。公元 189 年，汉灵帝驾崩之后，在一年之内，这个有着近四百年历史的，其间经历过王莽篡汉这样重大考验的大汉帝国，按道理再有些天灾人祸，也不至于一下子分崩离析；就东汉而言，这两百年也呈现过一派繁荣的景象，国家的各项“体检”指标大多还正常。换句话说，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所有数据，都证明东汉一切“正常”，都给不出必然轰然倒塌的理由。

可是，公元 189 年汉帝国突然出现宫廷政变、军阀割据、生灵涂炭，一下子原本还算平静的帝国，突然成了一盘散沙，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再也没了往日的风光。

这一年，不仅老皇帝死了（虽然这位老皇帝只有三十多岁），新皇帝也死了，最后又换上了另一个皇帝。想干掉宦官的外戚被宦官干掉，各路诸侯（或军阀）又干掉了宦官。但是唯一不变的是老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讽刺的是这一年的年号却是“初平”，乱到了这个地步，“初平”是多么痛的领悟！

很多官吏都没有准备，比如曹操。

第一个明显证据就是在这样重大的事情发生前的五年的一天，曹操还写下一首非常奇特的篇章——《对酒歌》。这首诗基本上是诗歌运用散文的写法，说明文当成歌曲来唱的创作思路。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这几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说对酒当歌，国家太平时，那就是官吏安于本职，不会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国君贤良英明，宰相以及百官各个出色，天下一片礼让；百姓和谐相处，公堂可罗雀。这简直就是天下大同的样子。

曹操最初对东汉政府的期盼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直到今天我们都感觉这就是世界大同的基本特征。而且，并没有什么劳作经验的曹操，还心系农业生产。在农业为本的社会里，所谓的父母官就是让百姓不经受战乱之苦、苛捐杂税之苦、天灾之苦，这样才能吃饱饭、不饿肚子、人心安稳。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诉求，恒定在这样的标准之上。

看来曹操没少下乡。按照汉朝对百官的要求，百官得不断地巡视。曹操也曾总结出了他的农业理想，希望他治下的那些百姓过上这样的生活。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

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春耕冬藏，百姓有余粮。老人受人尊敬，百姓

生活得到上天的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茂，没有劳役之苦。马匹只剩下马粪可用（用来促进植物生长）。

看曹操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绝对想不到这竟然是改造文章的一代宗师所写出来的。这样的朴素的话，绝对是田间地头老百姓的话。但是，曹操竟然写入了诗歌，即使淳朴的民歌也不会有这样的写法，看来曹操是铁了心写诗，要把散文的语言写进诗里。后世的苏轼等诗人大概就从曹操这里受到了启发。更重要的，把日常的农活写进自己诗歌里的写法，今天看来，也不是陶渊明的首创。其实曹操虽然没有“带月荷锄归，草盛豆苗稀”的句子，但是真的农活，他还是亲眼见了不少，把老百姓为了收成所付出的一切看在了眼里。

在《三国演义》中，一个抹黑曹操的著名片段就是曹操规定行军时不要践踏庄稼，违令者斩。后来曹操自己的马跑进了田里。按道理要重罚，结果曹操在执法官的极力劝阻下，没有以身殉法，只好割下自己的一缕胡须交给执法官。相当于用父母所授发肤代替肉身来认罪，以儆效尤。

由此，很多人就开始对曹操进行猛烈的攻击，认为他是个虚伪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轻易不能损毁的。而且曹操知道“民以食为天”，也是真正了解民生艰难的人。这种动不动就视之为“演戏”的思路其实才是最大的套路。

当然，大多有套路的人是不读诗的。

而且，曹操对自己的执政理念也有过一个雏形，那就是重刑名之法。他觉得理想的社会要得以保全，就得经历依法治国的过程。所以，虽然人的高低贵贱已经由国家决定了，但是当官还须为民做主，提倡孝道礼法，还要强调刑法律令。这就是一心为汉朝，道德、律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治理方案。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
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
人耄耄，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虽然这首诗里面已经有了曹操表达的牢骚与不满。他说到如今不如以前太平，帝国的运作也让人感到不甚满意，心里很烦。但是，他所勾勒的那幅美景，东汉政府确实实现过。而且看样子，曹操也不是想通过这一首诗来表达他要另立山头的想法，相反，他觉得自己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了。“太平盛世”，终究是文治武功的极致，是人臣的最大追求。当恩德遍及草木昆虫的时候，这也就是天下大同、人间大治的最美时节，想着都令人陶醉。

所以，这样的一个既有政治诉求也有治理方案，还能深入群众，仔细调研的曹操是全身心扑在事业上，要成就一番大事。而且，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说明曹操写的这首诗，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表个态度，秀秀自己的高风亮节而已。关键是曹操真枪真刀地干实事——这就是第二个证据。

公元184年，在东汉政府刚刚担任了济南相的曹操，就像公元174年的曹操一样，在他的任上展示了他一贯的从政风格：执法不避豪强，惩处腐败，弘扬正气。

两件事证明他确实有这种政治理想。一是公元174年先依法杖毙了当红太监蹇硕的叔叔蹇图。蹇硕这家伙身体壮硕，和名字比较般配，八面玲珑，深为汉灵帝倚重。汉灵帝曾经授予他上军校尉的官职，除了袁绍这样的声名显赫的贵族子弟不受他节制外，其他诸军校尉都得听命于他，这就相当于把握着天下的兵权。另外，汉灵帝驾崩之前，按照惯例要选择托孤重臣。这个传统我们见过。刘备驾崩之前，那可是穷尽智慧，

除了表露真诚，还连哄带骗，外加恫吓，多管齐下地把智力水平无法以正常标准衡量的刘禅托付给诸葛亮。但是大家并没有疑问，诸葛亮除了军事能力还可以商榷外，人品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个榜样，把孩子交给他，让人一百个放心。然而，汉灵帝选择的托孤重臣竟然是蹇硕。一个善于逢迎、身体壮硕的太监获得如此崇高的权力地位、如此之深的信任，除了说明汉灵帝早早驾崩也有上天极力解除民瘼的意志之外，也足以说明蹇硕“红”到了什么份上。

这么一个别人逢迎犹恐不及的人物，却接到他叔叔被活活打死的讯息。过程相当简单，一个刚刚到任的首都洛阳北部分局的公安局长（也就是洛阳北部尉），在衙门口两旁各摆放十余枚五色棒，规定有胆敢违法乱纪，挑衅执法部门者，不论身份出身一律乱棍打死。在京官难做的时代，很多人也就是吓唬吓唬大家。这偌大的京城，哪有几个人没有背景？蹇图，也就是蹇硕的叔叔，不信这个，觉得别说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就是总局局长又能拿他如何？他命令手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用怕这号人物。然后，他的队伍就违反了曹操这个“分局局长”制定的宵禁政策，大半夜地出现在洛阳街头，相当排场，也相当显眼。

曹操真不客气，审清问明，留下确凿的证据之后，下令将其乱棒打死。打死官员，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这就是伟大的交代，反之，是为官的耻辱。就这一顿乱棒，打出了曹操的声望，当然，也打出了危险。

蹇图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时候是“得道”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多少还有所敬畏和收敛，“鸡犬”可管不了这么多，往往更嚣张。曹操的手下看曹操玩真的，下手也不含糊，就算为民除害了。蹇图这把老骨头经得起酒色财气，经不起棍起棒落，估计没吃几棒，也就一命呜呼了。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就是打在蹇图的屁股上，疼在蹇硕的

脸蛋子上。虽然此事证据确凿，执法记录毫无伪造和篡改的痕迹，蹇硕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但是梁子是结下了。曹操由此“得罪”这么一个人，要是没有豁出一身剐的玩命精神，那肯定不会为了一些草民，在自己头上悬起一个定时炸弹的。报复随时都会到来，一旦来了，那就得用命来偿还。这就是我对那些上来就骂曹操的人非常反感的原因。如果当时是你，你有没有这份胆量？敢不敢为了百姓的平安和法律的庄严，赌上自己的性命？如果没有，骂人的时候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脸红了没？

第二件事就更了不起了。在汉灵帝时，发生了两次著名的“党锢之祸”，也就是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到王朝的清洗的大事件。虽然我们不排除里面也有害群之马，但是这股清流以史无前例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站在正义的天平之上。结局自然是悲壮的，也是悲惨的。在这个事件发生十余年之后，年轻的曹操上书为这批志士平反。要知道，这就是高危行为，因为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背后都有皇帝的意志。这样为一件王朝“基本盖棺定论”的事件平反，不是喝多了就是活够了，“除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样的曹操，大家要看清楚，起码也要看清他年轻时的样子：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地为汉王朝革除弊害，冲锋陷阵，置生死于度外，毫无畏惧地在战斗。上任之初，曹操就对国家弊政展示出一种零容忍的态度。即使是大崩亡之前的公元188年，曹操所做的也是这样的事。

当然，曹操这样做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汉王朝，大厦将倾。

历史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总想去把握它的规律，但是怎么也没法把握规律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就像公元1911年的春节，徐世昌还忙不迭地进宫给太后、皇帝请安。几个月后，全国的衙门都挂起了各式各样

的五色旗，革命成了时髦的事。曾经拥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十余个附属国的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顿时分崩离析。皇帝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当公元189年到来的时候，即使是曹操也肯定会觉得分外突然。

不解之惑

包括曹操在内，他们一定困惑不解。

古代的一个帝国有很多可衡量的指标，比如人口。东汉末年，人口保守统计也证明东汉在努力地超越前代，全国达到惊人的五千万户。在历史上，能与这个时代一较高下的只有唐、宋、明、清。我们没有当时其他国家的人口数据，考虑到一千五百年后的整个欧洲的人口还不能超越这个数字，我们不能不说，相比之下，在同时期诸多国家的人口基数还是“蚂蚁”的时候，东汉的人口就已经是一头成年“大象”了。

或许，有人会问：那个时候的人口普查是否准确？

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外行。大名鼎鼎的司马懿曾经做过一个小官：上计掾。这个官职干什么的？就是负责统计上报人口。两汉的时候，有非常完备的人口普查制度——上计制度，就是在天下大乱，献帝西迁时，一些地方官员还克服种种困难，历尽艰辛，向朝廷上计。其中有一个八个字的小故事：

夜行昼伏，乃到长安。（《后汉书·独行列传》）

汉朝一个负责统计人口的小官，在百官竞相逃命的时候，历尽千辛万险，把统计的数据报给汉献帝，这个人就是刘翊。

所以，汉朝的数据非常真实。那么，根据《续汉书郡国志》的数据，汉桓帝时期，虽然人口略有起伏，但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的时候，东汉人口达到了五千六百五十多万。（《东汉人口的增长演变》）这还不包括一些黑户口，而光武帝中兴的最后一年（公元57年），人口才两千一百万。这哪像是末代？

众多的人口，自然伴随着强大的经济发展。这样说来，如果政治基本正常，人口众多，只有两件事情会导致王朝败亡，一个是农民起义，另一个是外敌入侵。

麻烦在于东汉政府已经基本成功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一是黄巾起义，在汉灵帝时期基本已经平定，并没有直接导致这个国家“非正常死亡”。曹操也曾亲身参加了平乱的战争。二是，边境问题上，东汉时期捷报频传，经过东汉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解决了西汉政府没有解决的诸多问题，已经明显优于前代。东汉汉桓灵时期，涌现了“凉州三明”，即皇甫规（威明）、张焕（然明）、段颖（纪明）。一提到凉州，想必大家便会马上想到他们几位是了不起的将领和他们身上数不清的战绩。确实如此，这几位人物都是马上横扫异族、马下读书破万卷的将领，当时的匈奴以及匈奴族的分支鲜卑族、羌族等，都被这些将领驯服。我记得有位学者统计过：光是段颖就与东羌作战就多达一百八十次，其中斩敌三万八千六百人，汉军战死四百人，俘虏万人，获得牲畜将近四十三万头。如果不是东汉政府最后的选择出了问题，边疆的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再有与中原抗衡的能力了。当时的史书用了八个字记录，可谓是荡气回肠：

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

东汉在内政上，尚有强大的控制力；在军事斗争上，未留下明显的破绽，甚至还占优势。东汉与一般的末代王朝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明朝，明朝末年内外基本都已经失控，在内，李自成等人的军队已经可以直抵京师；在外，辽东全线溃败。

我们所说的不解之惑就是：多数王朝衰败的原因，在解释东汉衰败上都说不通。

荡尽忠臣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这是曹操的梦想。曹操一心想成为股肱之臣。

但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认为恰恰是东汉王朝荡尽了忠臣，才导致最后的覆亡。东汉末年的志士仁人，尤其是以党人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在反对外戚或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损失惨重。汉灵帝时的两次“党锢之祸”已经载入史册，仅在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被捕杀的党人已有一百多人，被禁锢起来终生不能做官的读书人六七百人，被抓捕的太学生一千余人。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与此极其相近的明朝末年，也出现了一股清流，也就是东林党人。史书在说东林党人就义时，记载了八个字：

鼎鼎相接，骈首就诛。（《明史》）

汉末也是这样的情形，甚至更加惨烈：“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杀

身以求仁”。这就是那时候的典型。说到东汉的党人，我们要提到范滂。

苏轼六岁的时候读过这样一则故事。其中涉及两段母子的经典对话，成就了两对不凡的儿子与母亲：

其母就与之诀，……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范滂因为反对宦官，被朝廷逮捕。在即将就义的时候，他与他的老母亲诀别。他特别恳请母亲不要因为自己而感伤悲泣，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实在是让人肝肠寸断。

范滂的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她舍不得范滂，但是她不会感到遗憾，她认为，在活得长久与不辜负美好的声望之间，儿子的选择是对的，即将做的是一件正义的事情，能和当时的那些领袖一起就义，这应该是范家的骄傲。这样的一种从容和刚强，如果没有跟他儿子一样伟大甚至更坚定的信仰，一位母亲是做不到的。

正是这种悲壮与残酷证明了清流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读完这个故事，六岁的苏轼哭了。他仰头问他的妈妈程氏：“我长大了做范滂这样的人可以吗？”这位老苏的夫人回答道：“如果你能做范滂，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做这样的母亲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对母子的伟大，就知道社会的真相是多么的残酷。

当然，党人中有愤青，甚至有败类；我也不否认党人有时候执拗、狷介、意气用事，但是其正能量远远大于负能量。他们为这个王朝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这支队伍退出了历史舞台，代表着东汉政府已经开始丧失了公心为上的那批官员队伍的支持，尤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关键人物的支持。更要命的是，这也打掉了仅存的一

点儿正义的期望，让真正的贵族荡然无存。因为不论是党人还是这些正直的官员，大多来自名门望族，他们之所以能够留名青史、光耀千古，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正义的代言人，更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能够分享自己既有的利益于天下，实属不易。

这样的一支队伍被荡尽，国家肯定会人心离散，因为剩下的人很多是渣滓。前面我们说过，曹操后来刚刚获得了一些政府的认可，就上书皇帝要求为党人代表的一批精英平反，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他是真心实意为国家考虑的。可是他也许没有想到，正是曹操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政治前途会毁于一旦的危险的举动，后来成为评价曹操的一个重要论据。今天的人好多都在骂他，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感激他，而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对国家抱着极度热爱的；而且，他们这种对曹操的感激是回报曹操，后来曹操起兵，为何他能这么快壮大起来，为何超越了一批老牌军阀，超越了很多豪门子弟？因为他在这面积攒了人心，尤其是争取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无论《三国演义》如何抹黑曹操，我们都不难发现曹操手下的知识分子在数量和质量上其实都远远胜过其他诸侯。（东吴也能攒下一些精英，完全是因为孙权的父兄当年也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赢得舆论支持；刘备凭借的更多的就是一个招牌——皇叔）

《后汉书》对党人的评价相当高：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茝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这个评价空前之高，也空前悲壮，以至于当代的史学家们谈起“党锢之祸”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这次事件将大批帝国精英送入冥府，加速

了东汉帝国的灭亡。虽然经过分析，这个说法有道理，它确实加速了灭亡，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还有矛盾存在：即使朝廷已经看起来如此无药可救，但是在汉灵帝后期（也就是汉灵帝三十多岁的时候），东汉并不缺乏名臣干吏。东汉政府内部，还有大量的精英人士，因为东汉儒学大盛，科教文卫全面发展，在政府的各级部门中，也不乏大量的饱学、干练之士，我们无须一一介绍。等到公元189年全国大乱之后，那些从朝廷出走汇聚到各路诸侯麾下的人才就是一个形象的说明，没有大量的人才，也基本不会出现“三国”这样恢宏的大戏，因为演戏的主角还是这些人物，群众只是群众演员。

与后代相比，印象中，北宋末年，贪官横行，官逼民反，甚至严重到官逼官反的地步，那真是自掘坟墓，满朝找不出几个拿得出手的名臣来。与历朝相比，汉末可不是这样，出现了大批名臣，比西汉的还要多。

那东汉为何还会灭亡？

症结所在

经过分析，虽然很多人都认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合力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最核心的破坏力其实就是东汉的两个政治肿瘤：一个是宦官，另一个是外戚。任何王朝，赶上一个就已经是重病缠身乃至不治而亡了。明王朝就是一个典型。东汉实在是太不幸了，赶上了两个。

有人说，宦官制度是中国君主专制机体上滋生出来的一颗难以清除的毒瘤。其危害之深广，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

而且它在中国历史上存留时间之久，也是世界罕见。

不管出自什么原因，这种生理、心理双重的残缺，肯定不会产生健全的人格，尽管其中还有一部分宦官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坏，他们只是卑微如草芥地活在宫廷绚烂的背景中自生自灭，如荒草，如蝼蚁。作家柏杨说，忽然有一天，这些卑贱人物，最初只是从皇帝老爷手指缝中窃弄一点权柄。最后，乾坤倒转，甚至连皇帝老爷都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脸色，才有口饭吃。他们就创造了一个使全国沸腾的“宦官时代”。那些令人鼻酸的人生和委屈成长的心路历程，使我们没有理由要他们比当权的主流高级知识分子表现得更好。

大多数宦官的知识水平很低。他们来自贫苦的家庭，没有得到知识和道德上的良好教育。从小入宫，他们受过人生太多的辛酸，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又怎么会表现得多么优秀呢？

而且，一个国家弄残了他们，报复国家和健全的人也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杀人取乐成了惯常。对那些反对者，要淋漓尽致地报复，这就是痛快！宦官为恶，一直是历史上的重头戏。

为何不能摆脱宦官干政的危局呢？

东汉有一个皇室自身的麻烦，那就是皇帝短命。东汉出现了很多婴儿皇帝，还有一批患有巨婴症的皇帝。这样一来，麻烦就出现了，小皇帝当政，掌权的多是太后。太后可以依赖的一般都是外戚，她们的父兄起码比别人更值得信任，毕竟她们孤儿寡母，没有自己人是不行的。而且越是出身低的太后，越依赖外戚，因为满朝的官员对他们心存耿介，很多权高位重的外戚并没有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却非常擅长作恶。这是外戚自身为祸的一面，比如东汉的外戚梁冀，那可是出了名的恶人。

而且有时外戚就是皇帝“天然”的敌人。小皇帝会长大。长大以后，想夺回权力，他身边可依赖的人自然不是外戚，外戚就是觊觎皇室权力

的人之一，也不能指望大臣。他们从小就在深宫，太后负责与外沟通，他们没有机会接近大臣，培植亲信。有的斗胆培植亲信或者表现出不满，必然死定了。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宦官，宦官想要权力，但是至少绝对不想当皇帝。比较典型的就汉桓帝。我们知道古诗中有这样的名句“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五侯”就是当年汉桓帝成功地扳倒外戚后，一天封五个宦官为侯，这就是“五侯”的来历。这样的“五侯”气焰之嚣张不用想就知道。后来又加封了三个宦官，也就是八侯。“侯”这样的爵位，在西汉就是功高之臣都不敢奢想的，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终其一生也没有被封侯。至于宦官，想也别想。可是汉桓帝很大方地一出手就封了八位。可是跟汉桓帝的子孙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汉顺帝成功地从外戚那里夺权后，一次性地封了十九个宦官为侯。封十九个宦官为侯。可以想象朝廷上有一大半大臣都是宦官。一说话，朝堂上就有一股阴气飘来。这个国家想健全地发展，有可能吗？

东汉帝国陷入这样的循环之中，不是毁坏社稷的外戚登场，就是本身素质低下的宦官掌权，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的官员本来是国家的砥柱，但成了失重的巨人，无法用力。这样的情况下，忠臣几乎被荡尽。剩余的忠臣心灰意冷，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什么热情。皇帝铁了心要败家，劝说还会丢掉性命，与其自己生闷气或者丢掉性命，不如索性让它烂掉，不再赞美也不讥讽、批评。可是，谁都知道，没有了批评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参与国家未来的热情。

能起作用的基本上都在发挥反作用；有才能的却不能施展才能。这种颠倒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是我想当时的官员还不会想到后面的悲惨结局。东汉这个国家机器已经运转了近两百年了，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大家还抱有侥幸心理，还都没有这个危机感，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事情有

点儿令人头疼。

那么，发生了什么导致“骨牌扑倒”、国家崩亡？谁又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谁也没想到，为了寻找出这个答案，整个国家竟然付出那么多代价。也没有人意识到，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人才解放的时代，竟然这样到来了。更没有人想到，当年的洛阳北部尉、典军校尉曹操，竟然与他的儿子们创造出了一段历史——三国时代最辉煌、跌宕的篇章。

欲知详情，请看第二章：汉末实录。